



民族语文概论

MINZU YUWEN GAILUN

李作南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民族语文概论

李作南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呼和浩特

民族语文概论

李作南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凉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125 字数：127千

1979年7月第一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100册

统一书号：9089·21 每册：0.60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4)
第一节 语言的起源和民族语言的形成	(4)
第二节 语言发展的基础和规律	(11)
第三节 我国各民族语言的来源和分类	(17)
第二章 民族语言的性质和特点	(28)
第一节 民族语言的性质和作用	(28)
第二节 语言的民族特点	(34)
第三章 民族语言与民族	(43)
第一节 语言与民族的联系	(43)
第二节 我国各民族使用语言的情况	(48)
第四章 语言同化是民族压迫的产物	(54)
第一节 关于语言的强迫同化	(54)
第二节 关于语言的自然同化	(59)
第五章 民族压迫时代我国各民族语言 在斗争中互相发展	(67)
第一节 我国各民族在斗争中互相学习语言	(67)
第二节 我国各民族在斗争中互相吸收语言成分	(72)
第六章 社会主义时代是我国各民族语言 蓬勃发展的时代	(80)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是我国各民族 语文确立平等关系的保证	(80)
第二节 我国各民族语言的蓬勃发展	(88)

第七章 社会主义时代我国各民族语言共同发展的道路	(95)
第一节 我国各民族将自觉地逐渐走向语言兼通	(95)
第二节 我国各民族语言在互相丰富中共同繁荣	(102)
第三节 正确认识各民族语言互相丰富的问题	(110)
第八章 社会主义时代民族语言发展的前途	(118)
第一节 社会主义时代民族语言发展的前途	(118)
第二节 关于共产主义时代民族语言的融合问题	(124)
第九章 我国各民族的文字问题	(129)
第一节 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129)
第二节 我国各民族的文字概况	(142)
第三节 我国各民族文字问题的解决	(150)
结束语	(156)

引言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有五十多个民族。其中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一些民族还有历史比较悠久的通用文字。

但是，在民族压迫时代，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我国各民族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少数民族语文，受到残酷的压迫和摧残。我国各民族的劳动人民，为争取民族平等，联合起来，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和民族压迫，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同呼吸、共命运，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结成了亲密的友谊，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我国革命的胜利，结束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旧时代，开辟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新纪元。

我们党一贯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语文平等，尊重、使用和发展各民族的语文，坚决反对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及其语言施加“镇压和强制”的同化政策，同各种民族压迫和不平等作斗争。毛泽东同志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对民族语文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规定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的民族语文政策。解放后，在全国政协共同纲领和我国的第一部宪法以及第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

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胜利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联合问题。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我国各民族语文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我国各民族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我国各民族语文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了自由使用和蓬勃发展，推动了我国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是我国各民族语文确立平等关系和自由使用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

但是，长期以来，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党集团，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抛出民族语文工作“黑线专政论”，恶毒攻击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否认社会主义时代民族和民族特点的存在，侮蔑少数民族语文“无用”，把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诬为“保守”、“倒退”、“不革命”等等，全面否定党的民族语文工作，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和落实，给民族和民族语文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以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进行新的长征。各条战线，万马奔腾。在民族语文问题上，也亟需把被林彪“四人帮”搅乱了思想和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坚持民族和民族语文平等，进一步发展民族语文，加强民族团结，为尽快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

为了帮助全面地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本书扼要地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联系，民族语文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我国各民族语文相互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等问题；着重阐述

了我们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理论基础；指出我国各民族语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蓬勃发展，对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同时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各民族语文共同发展的前途和道路。

本文由于叙述的需要，也涉及到了国外一些民族的语文情况。

我们坚信，在清除了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以后，我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必将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我国各民族语文，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语文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必将更加繁荣昌盛。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度中，我国各民族语文必将充分发挥自己的巨大战斗作用。

第一章

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语言的起源和民族语言的形成

人类的祖先，在还没有成为人类之前，同其它动物一样，既不能制造劳动工具进行劳动，并在劳动中组成社会，也没有语言以及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思维。就是现代的类人猿，虽然也可能发出几十种单调的音节，但它仍然没有语言和抽象思维。语言的起源，是和人类的起源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语言以及人类本身。

人类的祖先，在还没有离开动物界以前，完全是靠自然界的给予来生活的。它没有能力得到比自然界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动物的这种“掠夺经济”，迫使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双手去从事劳动。劳动强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变成人。这种劳动，起初主要是靠手来进行的。这种劳动经常化之后，便进一步促进和巩固了人类祖先的手和足的分工。与此同时，人类便开始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不仅使人类祖先的视野广阔了起来，有可能观察和接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直立行走还使人类的口腔和喉腔安排成直角形，使他们能发出多种多样的音节，保证了语言中语音部分的形成。又由于劳动，使人类能得到更多的食物，给大脑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营养资料。劳动使手同其它事物的接触增加，使神经系统能接受多种的刺激，使大脑和各种神经发达起来，从而使人类祖先能更进一步认识自然界，使他们的认识能力不断加

强，使类人猿的思维能力有可能发展到抽象思维的阶段，使语言中的意义部分得以形成。这些都使人类语言的出现具备了可能性。

人类的劳动，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他们必须生活在一定的集体之内，互相帮助、共同协作，才有可能征服自然界、抵御自然界和猛兽的袭击，保证顺利地安全地进行劳动生产，以获得比较丰富的生活资料，并使劳动生产得到不断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通过人与人在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中的联系与合作去进行的。劳动帮助各个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人类组成一定形式的社会组织，并决定人类社会的社会生产关系。人类如果不用相当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从事生产。而要从事生产，人们便必须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经过这些社会的联系和关系，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才会有生产。

劳动既然使人类组成社会，并形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人类既是劳动的动物，又是社会的动物。正是由于劳动在社会中不断进行，便使“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种不可缺少的交际和交流思想以调协共同劳动的迫切需要，就迫使我们的祖先从劳动的过程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了语言和抽象思维；同时借助于语言的推动，使人类的脑髓和感觉器官进一步发达起来，使思维和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人类离开动物界愈来愈远。

可见，语言的产生离不开社会集体的劳动。劳动和社会提供了语言产生的可能和需要。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产生语言；没有社会，语言也不可能形成和存在。同样，劳动和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结合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达到我们今天所有的进步的力量之一。”（斯大林《马

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人类一开始出现的语言，就是有声语言。它是由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完整的系统。当然，“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基本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文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文法构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且，当时人类的发音器官也不像现代人的发音器官那样发达，发出来的语音也不可能是很清晰的，音节自然也是比较和比较简单的。尽管这样，它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人类进行抽象思维和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工具。这些语言，就是后来发展成现代各种语言的“基础语言”。

人类产生以后，便出现了人类的第一种组织——氏族组织。氏族是以血缘亲属关系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一种原始人类的组织形式。

这时，地球上存在的氏族组织当然不止一个，也不是无数个，而是有很多个。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社会交际工具——氏族语言。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地球上就不只存在一种氏族语言，而是有许多种氏族语言。有些氏族，由于有来源上的“亲属关系”，他们的语言可能是非常近似的；而有些氏族，由于没有来源上的“亲属关系”，他们的语言就可能是很不一样的。由于氏族组织内部的成员开始时相当有限，而且与外界的接触不多，因此，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相对说来是比较狭小的。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的分工，氏族组织便逐渐分化而瓦解。于是，出现了部落。部落是由氏族发展而来的，是由亲族氏族的分化和合并而成的。部落内部的血缘亲属关系由于氏族的分化和合并仍然保存了下来，但它已没有氏族组织那么单纯、紧密而比较复杂、疏远了。部落内部的交际工具是部落语言。部落语言是由所包含的氏族语言结合而成的。部落内部的各氏族语言实际上作为部落内部的不同方言而存在着。部落语言事实上只存

在于这些不同的方言中。而且，由于部落是由亲族氏族分化和合并而成的，因此，在开始时，亲属部落之间也并不存在独立的语言。它们同样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恩格斯说：“在事实上，部落跟方言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在部落社会里，它们内部虽然人数不多，但居住在广阔的土地上。由于需要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人们不得不经常迁徙和移动，因而使部落组织发生分裂。他们的语言，后来也就不可避免地随着发生了分化。恩格斯指出：“分离的不变趋势根源于氏族组织的分子中；这一趋势由于语言中形成区别的趋势而加强起来，……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的辽阔性上，语言中的区别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地方性的分隔——在空间上——渐渐引起语言中差异现象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这种“通过分裂而形成新部落和新方言的现象，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过，并且今天也未必已经完全停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谈到部落分裂引起语言分裂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我们从北美印地安人中可以看出来，一个原来统一的部落怎样渐渐地散布于广阔的大陆上；各部落怎样分裂而转化为部族，转化为完整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彼此不能了解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来统一的任何痕迹；此外在部落的内部个别氏族又怎样分裂为几个氏族，老的母系氏族以胞族形式保存下来，但这些最老氏族的名称在很疏远的和早已彼此分离的部落中间仍是一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然而，有些部落，由于需要，可能结成暂时的或永久性的“部落联盟”。这种永久性的“部落联盟”后来可能走上“民族形成的第一步”。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便有可能逐渐走向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由于社会发展的原因，一般不可能是很彻底的。

总之，在部落时代，语言的分化是很急剧的。它们有时“不仅成了彼此不能了解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来统一的任何痕迹”。这就表明，在部落内部，不仅方言分歧可能相当复杂，而且后来往往可能形成和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语言。这种分化的趋势，是部落时代语言发展的重要特征。

社会进一步发展，部落便分化瓦解而形成部族。部族的形成已与血缘亲属没有联系。它是以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等特征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部族内部存在着部族语言。部族语言是由所包含的部落方言组合成的。但是，在部族时代，由于已经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而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后来又出现了印刷机，出现了出版物，——所有这一切都使语言有可能开始向统一的方向发展。或者，至少对语言的分化起着遏止的作用。特别是因为文字的出现，就有可能使部族内部出现一种统一的书面文学语言。如我国先秦时代的所谓“雅言”和后来的所谓“文言”以及宋元以后的“白话”，就是汉部族内部存在的统一的书面文学语言。统一的书面文学语言的出现，是部族时代语言走向统一的主要表现。它不可避免地对语言的分化要起某种遏止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部族语言由于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群众口头语言的统一趋势一般是很缓慢的。它们原先存在着的分歧，往往还不可避免地继续保持着。特别是当“一个部族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它的统一的语言因为国家崩溃便瓦解了；至于还没有在统一语言中被磨掉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另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部族分开了和分散了，聚合了和融合了。这就不仅使一个部落语言或部族语言可能分裂成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语言；而且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部落语言或部族语言也可能融合（在民族压迫时代，语言融合表现为一种

语言战胜或代替另一种语言，即同化）成一种语言。在部族时代，由于出现了剥削阶级的压迫，各部族间发生压迫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语言间的压迫和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反动剥削阶级的压迫剥削制度和政策、强族对弱族的侵略和奴役，使弱小部族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而且在语言上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这种压迫和不平等，就是语言同化的社会根源。语言同化一般表现为一种语言的胜利和另一种语言的失败。胜利的语言一般都代替了失败的语言。失败语言的使用者被迫采用了胜利的语言，而不产生新的第三种语言。在特殊情况下，语言斗争的结果，也可能形成一种所谓的“混合语”。语言同化是部族时代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时，在部族时代，由于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扩大，文化交流的逐步广泛，语言间互相吸收的机会也就大为增多。在各族语言中出现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借词。各族语言间的互相吸收，一般说来都推动了各族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这也是这一时代语言发展的一个特征。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为民族，而部族的语言就变成为民族的语言。

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它往往都是由不同的种族或部落混合组成的。例如：“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刺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他们组成为一个民族后，都共同使用着一种统一的民族语

言。

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起来的。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能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民族市场，因此才可能把不同的种族或部落组成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应当指出：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起来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的因素。由于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起来的，它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的烙印，因此，我们称这时的民族为资本主义民族。对资本主义时期以前的部落和部族，我们一般称它们为资本主义前时期的民族。当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民族便转化为社会主义民族。

资本主义民族存在着统一的民族共同语。统一的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则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一部份是由于语言从准备好的材料中历史地发展起来，如罗曼诸语言及日耳曼诸语言；一部份是由于各民族的交配和混合，如英语；一部份是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所决定的各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民族时代的语言特征，除了它的统一性外，还由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更为广泛，各民族语言间的互相吸收也表现得比以往更为广泛。另外，由于资本主义的存在，特别是后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出现，它们对国内各民族的统治以及对殖民地各弱小民族的侵略、压迫、奴役和榨取特别残酷，使各弱小民族的语言遭到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的摧残、歧视、限制和禁止。反动的强迫同化政策，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各弱小民族语言的发展；而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和语言平等的斗争也更加激烈。

只有到社会主义时代，民族间才能获得平等；民族语言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自由使用和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得到形成和巩固以后，世界各民族及其语言在平等的和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将自行消亡，世界各民族语言将融合成一种全世界统一的世界共同语。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都是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东西。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都有自己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与之相适应，它们的语言，也有其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人类组织从氏族社会到部落社会，从部落社会到部族社会，从部族社会到民族社会，中间经过了多次的分化、统一、混合和同化。他们的语言也经过了多次的分化、统一、混合和同化。原来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后来可能已经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了；原来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后来可能已经共同使用一种语言了。而且，不论何种语言，都吸收过他族人民的语言成分。语言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受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制约的。

第 二 节

语言发展的基础和规律

我们从民族语言形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础。

斯大林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出现了印刷机，出现了出版物，——所有这一切都使语言发展起着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部族分开了和分散了，聚合了和融合了。往后，

出现了民族语言和国家，发生了革命，发生了旧社会制度与新社会制度的交替，所有这一切使语言及其发展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语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表现为新的语言成分的产生，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旧的语言成分的消亡。同时，有些语言成分的意义或用法改变了，语言成分间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发展和变化，都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就以有关生产方面的词来说，语言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是立刻发生的。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都要求语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汉族在畜牧业时代，由于需要区别家畜的详细种类，就产生了大批有关家畜的词。以猪类为例，有“豕”、“豨”、“豨”、“豨”、“豨”等等。到农业时代，人们有必要区别农作物的种类，又产生了大批有关农作物的词。以谷物为例，有“谷”、“禾”、“黍”、“稷”、“麦”、“稻”、“秬”、“粱”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这些词在普通话中就只剩下“猪”、“稻”、“麦”还经常使用，其它都已变成僻字或不常用的字了。在阶级关系上，封建统治时期的旧中国，许多极平常的事物和现象，对各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来说，在汉语中都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同是男子的配偶，天子的叫“后”，诸侯的叫“夫人”，大夫的叫“孺人”，士的叫“妇人”，庶人的叫“妻”；同是死，天子叫“崩”，诸侯叫“薨”，大夫叫“卒”，士叫“不禄”，庶人死才叫“死”，等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封建社会的覆灭，这些词就只有极少数被保存了下来，意义往往也发生了变化，而大多数都已经消亡了，只有在接触到历史史实或特殊情况下才运用它。汉语的这些发展和变化，都反映了汉族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任何民族的社会发展变化，包括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都能在民族语言中得到反映。我们从这些反映中，可以了解到各民族在不